

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消解及其警示*

武 豹 吴学琴

[摘要]对建党历史的记忆建构,是中华民族共享建党史实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巩固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建党记忆具有连贯映现建党历史、解析辨异多元文化和整合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意义。然而,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模糊建党的事实记忆、虚无建党的符号记忆以及销蚀建党的数字记忆,在深层次上引发个体记忆断裂、诱导个体记忆重置、诱使个体记忆偏向。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消解,必须以多样化具象符号锻造建党记忆信码、以情境化“记忆之场”刻写建党历史光影,在强化建党记忆中赓续伟大建党精神。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建党记忆;伟大建党精神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4)02-0033-09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1](p.497)]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同时开启了绵延至今的建党记忆。建党记忆确证和赓续了党的百年奋斗史,昭彰了党的历史经纬、政治

品格和光辉形象,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采取非历史态度,利用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妄图否认和摧毁建党记忆,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从记忆向度审思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深层破坏逻辑,廓清其隐藏性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研究”[23CDJ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武豹,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吴学琴,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缘起:建党记忆的特殊意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附着

从现实个体来说,记忆是主体的神经系统对过去经验的心智反映,表征着人对记忆本相的客观投射,其基本过程包括识记、保持、再现、强化、传递等,这是人脑的自然属性。从记忆的社会属性来说,“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它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2](p.20)}也就是说,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记忆可分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前者是个体中枢神经等基质器官的展现,后者则是具有某种同一性和文化内聚性的共同体成员,在特定的社会情境或一定的交往实践中理解“我们是谁”,进而获取身份认同、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集体记忆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关系结构,否则就会因彼此间交流分享的缺乏而在时间的推移中被淡化甚至遗忘。

建党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类型,从狭义上看,是指对1921年前后建党先驱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段历史事实的意象展现,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选择性建构产物。建党记忆是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通道,不仅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初心使命,而且是凝聚价值共识、增进政治认同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因此,为诠释“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唤醒和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建党记忆的主要建构者,往往通过多种介质形态(口述、文本、仪式、遗存、图像

等),在主导性、重复性纪念活动中延续建党历史的事实记忆,不断在成立史的言说中夯实合法性。对建党记忆的关注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在当代社会展现出特有的强大功能。

第一,连贯映现建党历史,为共同体成员坚定历史自信提供心灵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历史自信是主体对其所历经的历史的认同、尊崇和自豪,并以此为激励自身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是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特指对党的百余年奋斗成就和伟大奋斗精神的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继承优良传统、赓续历史伟业的自信。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基础,历史记忆是映现建党历史、形成历史认知的重要媒介方式。只有铸牢历史记忆特别是党史记忆,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真理“养分”、精神“养分”和信仰“养分”,才能不断升华历史认知、丰富历史智慧,形成正确党史观,树立坚定的历史自信。建党记忆是党史记忆的开端,是党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记忆原点,是理解“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此意义上,共同体成员对建党历史的记忆建构,正是对百年大党历史文化和基因密码进行追溯、澄明和感知,进而增进党史认同、提升历史自信的过程。

第二,解析辨异多元文化,为共同体成员辨别是非提供基本参照。在多元思潮不断涌现的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体思维领域构筑了共同体成员的潜在解析能力。一般而言,崇高的文化形态及其内蕴的价值观能够激活个体的精神力量,塑造个体的崇高理

想,从而使其树立和坚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辨别是非、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的能力。建党记忆是以革命年代的历史事实为记忆本体、展现科学历史认知和凝结正确价值导向与行为导向的集体记忆,其所蕴含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能够使个体在结构性解析和价值性辨异中正确区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优秀文化与腐朽文化,在实现以主位文化为参照的文化选择和价值甄别中,筑牢心灵场域的精神高地。

第三,整合凝聚价值共识,为共同体成员投身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征程中一以贯之的目标追求,是指引共同体成员不懈奋斗的恒定精神要素。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就是激发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情感,铸牢共同体成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3]p.35)}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建党记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挺身而出的英雄气概,为“破坏一个旧世界”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通过体系化的符号标识和纵深性的叙事结构,建党记忆在对历史延续性的反复展演中,以全体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经历、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来凸显彼此相依的同一性,对以文化记忆层面的一致性,驱动实现共同体成员心理上的聚合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4]p.105)}通过建党记忆这一“信仰的盛宴”,人们得以走出自我狭隘,获得一种“同属一体”的心理定向,从而

在认清“我们是谁”的基础上,萌发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强烈担当精神,锻造奋斗品格。

然而,记忆在线性向前的时间维度中并非永恒存续。随着革命战争年代消逝,建党记忆也面临被抛向遗忘黑洞的危机。作为一种严重危害意识形态安全的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又在不遗余力地破坏与消解中加剧了建党记忆的遗忘化程度。

从发生学角度看,记忆首先是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思想源泉。但由于人的生命长度的有限性,加之大众日常生活对他物的高度依赖,因此,对记忆的保存往往需要借助具有承载性和建构性的媒介介质。利用媒介存储、复刻历史,是数字信息时代弥补人类记忆能力缺陷,克服代际“失忆”的重要手段。而谁在使用媒介、如何使用媒介都意味着一种解释权,有学者将“解释”视为媒介记忆的核心原则,认为只有为媒介建构内在的意义关联,才能使历史被集体不断记忆和不断回忆。然而,“解释具有‘彼此的开放性’,解释者的主体性因素处于不断改变的动态中”,^[5]加之媒介是一个近乎无限开放的记忆空间,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这就意味着对建党史实的主观筛选及意义关联的差异化重置,都使建党记忆不可避免地敞开通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门,成为后者的附着之地。现实地看,无论是针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还是其他群体,历史虚无主义都试图在对建党历史本体及其内含价值观的刻意误读与非法改写中,抹去共同体成员的共有集体记忆和精神支柱,从而使整个民族陷入“记忆荒漠”。历史虚无主义潜藏着部分西方国家特定的意识形态图谋,看似是百家争鸣的学术问题,实则是祸心包藏的政治问题。其根本目的就是颠覆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基于此,深度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消解逻辑,成为建党记忆建构与传承必须直面的重要理论任务。

二、深度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消解逻辑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模糊建党的事实记忆、虚无建党的符号记忆及销蚀建党的数字记忆,引发个体记忆断裂、蛊惑个体记忆重置、诱使个体记忆偏向,在深层次上消解着建党记忆。

(一)模糊建党的事实记忆,引发个体记忆断裂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建党的历史事实客观昭示了党的发端,也为党和国家阔步前行提供了底气。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借建党历史书写中史料不足的局限和若干关键细节的争议,虚无重释并刻意模糊党的创建史,从而制造混乱,引发人们对党史实的记忆断裂。

客观来说,尽管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事实已有充分研究,但囿于主客观因素,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还原与追索迄今仍未穷尽。从历史条件来看,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党自身的性质以及寻求隐蔽和安全的客观需要,都决定了建党活动不可能举行公开仪式,更不可能合法登记注册,这就为后人完整准确地描摹建党轮廓增添了一定难度。从主观方面来说,即使有一些被挖掘出来的所谓口述、实物、日记等“新史料”,但其或是有关建党历史的片面细节,或是无法被佐证的“孤证”,或是缺乏评判标准的非共识性结论。因而,想要究尽建党活动的前前后后,就成为一

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以此大做文章,在建党背景、建党过程、建党细节和建党影响等若干历史纷争问题上进行攻击。具体来说,就是有意模糊“一大”成立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一大”代表人数与代表资格、“一大”闭幕日期以及陈独秀和李大钊缺席“一大”原因等等历史事实。譬如,认为将“一大”被选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是为了凸显毛泽东在建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6](p.255)}又或者无视当时社会的客观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阶级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事实,精心炮制“野心家论”“凭空制造论”“俄国外援论”^[7]等谰言,否认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因果规律。凡此种种,将会造成人们建党记忆链条的断裂。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刻意在建党常识中制造留白与想象空间,以一种非言自明的意会性,诱导大众对既有建党史实进行“再审视”“再评价”,继而在反差中实现虚无目的,这就造成了正统历史的分裂,冲击了已然形成的一般党史共识。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以虚构为逻辑起点,具体而微地提供“甄选”的建党历史内容、“共鸣”的建党历史细节等,抛出新的“问题域”,诱使人们脱离原有认知框架,形成偏误化思考。这不仅带来新的意识形态风险,也使建基于建党史实基础之上的“当下”成为无根基之物,继而引发建党记忆的合法性危机。这些不实之举,最终致使建党历史的实在性遭遇本体层面的拷问,并反向吞噬个体对于建党历史的记忆意义探寻,表现出较强的破坏性。

(二)虚无建党的符号记忆,诱导个体记忆重置

符号是记忆的存储形式和记忆传递的基本要素,一定意义上说,“记忆本质上就是符

号叙事或建构的过程”。^[8]记忆主导者通过“感知—接收—解释”的符号化过程,引导人们在对符号的“感知”中接收其所携带的意义,并获得崇高的精神体验,从而实现记忆的传承与教育目的。就此而言,符号也是呈现记忆表征意义的津梁,具有极其重要的唤醒与建构功能。

符号与人类政治紧密相关。在政治活动中,承载着特定政治信息的符号“发挥着建构、改变或者维系权力实践的作用”。^{[9](pp.106-107)}就建党政治活动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主体符号,北大红楼、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等建筑符号,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人物象征符号,“一大”纲领、“一大”宣言等文本符号,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记忆的具象化载体,凝缩着关于“党如何成立”的事件联想。建党符号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机制化展演与无声化浸润,以“能动意象”的作用方式,不断诠释和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艰难探索和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风貌。而个体在建党符号“凝缩—诠释—内化”的铺展中,才得以脱离“飘浮无序”的游离状态,在以“无意识”的惯习机制获取建党历史信息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情感共鸣,继而自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价值体系,生成共同体归属感。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却意图通过对建党记忆符号的虚无,离散其与建党历史事实的合法关联,继而蛊惑个体进行记忆重置。以人物象征符号为例,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孤立建党先驱人物,阻隔其与历史背景的联系,脱离历史条件进行唯心的分析评价。譬如,以对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建党实践中,重实际行动而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集中轻民主、重对共产国际的依赖而缺少自主领导中国

革命的主体意识的历史局限的非难,^[10]而抹杀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革命史中的开创地位。毋庸讳言,建党先驱的光辉业绩早已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既不能跳脱历史背景对其求全责备,也不能以其“后半段”政治实践中的迷向全盘否定其对“前半段”历史的事实贡献。因而,对建党初期陈独秀这个人物象征符号的虚无,实际上就是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形象。又如,历史虚无主义散播“革命阴谋论”,通过否定毛泽东英雄象征符号和中国共产党主体符号,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偶然性因素、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11](p.210)}从而否定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缺乏建党记忆体认与内化的个体,必然在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历史错置感”,继而丧失正确的价值判断,被历史虚无主义所“俘获”。

(三)销蚀建党的数字记忆,诱使个体记忆偏向

传统上,克服时空转换下记忆衰变的方式主要是亲历者回忆、记忆机构、历史教材等有形的“回忆空间”。当下,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数字媒介普遍应用,推动数字信息倍级涌现,极大超越了个人接收信息的能力范围。由此,记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储存设备,记忆因之渐趋转向数字记忆的形式。

不可否认,数字记忆有其特殊的赋权意义。一方面,数字媒介的即时性、开放性特征,降低了记忆参与门槛,每个个体都可以更便捷、更自主的在各类网络平台开展数字记忆实践。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技术逻辑,还允许将个体的日常见闻转化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使后者能够参与集体记忆的书写过程。此外,数据的海量性、稳定性、可储

存性等特征,以及互联网的强大承载能力,也使始终处于活态流动中的记忆固化为以符码化形式呈现的“永久记忆”成为可能。这种“永久记忆”能够跨越时空,阻断人类的自然遗忘机制,为后代的记忆回望留下随时可以追溯的“踪迹”。由此可见,数字信息时代,数字记忆的重心已经由简单的“媒介再现”转向复杂的记忆实践,即每一个人都依托数字媒介进行记忆或者遗忘。毫无疑问,数字记忆这种开放式建构、多媒体联通与迭代式生长特点,^[12]将不可避免引发不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记忆竞争与冲突,进而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可乘之机。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数字媒介销蚀建党数字记忆的惯常手法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记忆的“社会化编写”环境中破坏建党记忆的总体性框架。建党的数字记忆固然开启了大众书写时代,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填补和丰满建党记忆缝隙,但是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记忆赋魅预留了空间。在数字媒介上,随意化的个人参与取代了规范化的集体参与,加之有关建党历史信息的过载与把关人的缺位,历史虚无主义得以通过拼贴、过滤、裁剪、虚构等技术手段,肆意篡改建党记忆,营造出泥沙俱下的“记忆气候场”。譬如,在“逢五、逢十”的重要建党纪念节点,历史虚无主义恶意掀起重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讨论,意图在极具暗示性、传染性的舆论热点中,引诱大众脱离集体记忆框架,而否定建党史实及其深远意义。与此同时,被历史虚无主义裹挟的个体,又容易过多将自身虚妄幻想和情感预设投射至建党集体记忆框架,以边缘叙事取代主流叙事,以微观叙事取代宏观叙事,以碎片叙事取代整体叙事,从而消解了建党记忆的主导性、主题性和统一性。

第二,在算法加持下的精准推送中诱导建

党记忆的主客体分离。算法是数字记忆与遗忘的装置,隐蔽地操纵着记忆的分配。数字媒介时代,大众注意力转瞬即逝的特点与现代社会浅表化、碎片化的阅读症候,契合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非理性思维需要。利用算法技术的非透明性技术特征,历史虚无主义精准捕获个体记忆轨迹,掌握个体记忆需求,利用鼓动性的话语叙事、夹带虚无价值的信息等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炒作和推送“流量记忆”“娱乐记忆”“话题记忆”,制造“记忆狂热”,引导大众在应接不暇的记忆“漩涡”中停留驻足,从而挤占其对建党历史的感知空间,最终使大众中断与建党数字记忆的意义连接过程,迷失于记忆汪洋。其根本意图就是要诱使个体将记忆对象从主流转向支流,将记忆心态从严肃转向轻佻,继而“驱逐”个体生命对于建党史实的记忆体验,为建党记忆抹上尘埃。

三、纠治之道:解蔽历史虚无主义 消解建党记忆的策略选择

建党记忆不仅具有历史印证、血脉赅续的作用,而且作为意识形态隐喻,具有重要的认同导向功能。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是连贯的,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破坏手法,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一定市场。鉴于此,必须直面历史虚无主义冲击,采取有效举措,坚决克服其所带来的记忆断裂、紊乱和隐退等消极后果,以永葆建党记忆生命力。

(一)以多样化具象符号锻造建党记忆信码

如前所述,具象符号作为记忆系统中最基本要素,是历史事实的形态学依据,既映现着历史情节,也是激活个体记忆的催化剂。人的意志具有能动性,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背后

反映着个体的主观认知、价值判断,也影响着记忆成效。因而,建党记忆的具象化建构,应以多样化、具备感染与内化作用的符号元素,锻造记忆信码、编织记忆之网,将“党从哪里来”的抽象命题转换成与建党时空关联的具象之物,在引发个体目光注意、调动个体感官体验的基础上,触发其记忆复苏与情感生成。

第一,构筑多样立体的图像符号系统,并以对符号表意的官方诠释抵抗模糊的虚无拟像。读图时代,以“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图像叙事无疑更能激发个体注目。广义上的图像,是指包括影视、广告、绘画、摄影等在内的基本表意系统。图像不仅具有承载建党历史时刻的空间内涵,而且还有记录党的历史发展的时间特性。因此,应精心打造多层次、多形态、多维度的图像符号体系,充分结合H5、VR、AR、MR、全息投影等现代技术,以感性直观的视觉化方式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和生动细节,实现对建党空间的深度复原,让受众“视觉在场”“身体在场”“情感在场”。譬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主流媒体纷纷依靠技术赋能盘活静态史料,推出建党百年主题MV《少年》、H5作品《红色冲印馆》、《复兴大道100号》“线下体验馆”等一大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将视觉符号、听觉符号等各类图像符号交互联动使用,将党史历时性凝结为主体共时性,以更具刺激性、嵌入感的感官效应实现了对建党记忆的初步唤起。与此同时,在关注图像符号叙事时,也要重视对符号的意义所指进行权威诠释,目的就在于铲除历史虚无主义从价值层面解构符号的土壤。建党记忆属于代际间传递的长时记忆范畴,既需要不断建构时代性的符号系统以利于记忆传承,也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

流动的时空长河中对符号价值进行有意虚无。因而,在以图像符号进行叙事的过程中,要充分讲清楚符号背后承载的建党细节、建党意义、建党影响等,保证符号体系始终在统一诠释中有效贯通、衍生价值,避免因时空变换产生建党记忆的模糊、偏差与撕裂。

第二,在明晰指示性基础上实现图像符号对建党记忆的确证,促成个体与建党记忆的情感链接。符号的指示性,是指符号与表征对象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逻辑关系,^[13]指示性图像符号的表征对象是当下承载着历史时空的某种实物、事件或记忆构境。就承载建党记忆的指示性图像符号而言,上海石库门等记忆空间、“一大”纲领等记忆文本等都属于经典的指示性图像符号,共同指向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事实记忆。人们一听闻这些指示性符号,就会在内心映现符号所指的建党人物、建党历史及其深层内蕴的伟大建党精神。因此,应注重在党史研究特别是建党历史的研究中,不断挖掘具有鲜明指示性的图像符号,并对这些符号进行有机重组和意义再输出,建立起与建党历史的有效关联,进而实现其对建党记忆的合法确证。与此同时,以指示性图像符号唤起建党记忆的同时,必然伴随个体情感体验过程。情感是身体进行自我启动的方式,表面上看属于个体心理状态,实则同环境互动、社会交往密不可分。有观点认为,情感生成于身体与心灵的复杂建构过程,而记忆建构正是指向情感的心灵维度。历史虚无主义常诉诸情感,将过往记忆情感化,在情理倒置中以当下感受主导一切,进而消解历史的真实、逻辑与崇高,作为记忆信码的具象符号也被抽离意义和价值。因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情感抵制”,还要以图像符号为联结点,

强化其与个体的互动关系,通过图像符号建构的记忆构境,以交互多样的复合刺激催生个体情感共振,持续加深“个体—符号—情感—记忆”的互动关系。

(二)以情境化“记忆之场”刻写建党历史光影

如果说具象化图像符号是历史本体借以投射记忆、释放意义的必备介质,那么,“记忆之场”则为整合多样化的具象符号和稳固历史记忆提供了宽广场域。有学者提出“记忆之场”概念,认为历史加速消失,与当下的张力正逐渐拉大,构建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可感可触”的空间场域即“记忆之场”显得尤为重要。“记忆之场”是实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并存的综合体,是个体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寄放记忆”与“唤询记忆”之地。“记忆之场”包括显性的物理空间和隐性的仪式场域。^[14]因而,刻写建党历史光影,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打造有形的纪念场所。纪念场所也即历史的象征之所,是建党历史传达自我形象的最常见、最主要场域,是建党记忆凝缩和存储的物质载体。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档案馆以及南湖红船等建党遗址是具代表性的有形纪念场所,也是佐证建党历史事实和细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某种意义上说,承载着建党记忆的纪念场所,是在特定时空中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的一种“神圣空间”。这种“神圣空间”有其自成体系的场景设置和意义编码,内隐不言自明的精神旨趣。参观者穿越时空障碍,在红色介质的循循引导下移情、想象,实现从“具象真实”到“具身真实”的嵌入和转向,继而获得建党历史的延续感。可见,有形的纪念场所对于撒播历史火种、锚定

历史记忆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打造有形的“记忆之场”,一方面,要以符合大众审美为前提,优化记忆空间。通过合理挖掘建党时空资源、进行空间模仿性复制等方式,从装饰摆设、雕塑风格、配套设施等多个方面,修复历史碎片、钩沉历史细节,建立起关于建党记忆的情景脉络。结合现代虚拟技术,再造智能化陈列空间,有选择性地推动建党记忆再生产。另一方面,要积极研判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特点,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纪念场所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历史虚无主义不遗余力以情“化”人,滋扰个体情绪状态,颠覆建党历史和建党记忆。对其匡谬正俗,应在渐次展开、层层递进的历史还原中,营造主流价值氛围,聚力凸显纪念场所内蕴的核心价值,传播扩散伟大建党精神。个体只有在散发理性的纪念场所中,才能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和价值共振,不断体认、内化价值记忆,增进价值认同,形成防护历史虚无主义的屏障。

第二,打造隐性的仪式场域。纪念仪式“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15](p.90)}因而是推动历史事实“情景复现”和历史记忆“活态传承”的重要方式。有学者申明仪式之于集体记忆的意义,认为程式化和固定化的仪式性操演传承和维系着过去的知识和意象,能够让人们产生习惯记忆,群体成员的认同和信仰就在这种无意识的习惯中登场。因此,族群时常定期或不定期的借以纪念仪式活动来强化集体记忆。同样,在特定时空的坐标轴上打造建党纪念仪式场域,让参与者在“集体欢腾”中接收仪式中的建党史实及其内蕴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刻写建党历史光影继而延续集体建党记忆的重要途径。譬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

仪式上,升国旗、致献词、庆祝表演等程序化、固定化的仪式,建构起富有感染力的“象征之林”,实现了建党记忆精神内核的传递。打造隐性仪式场域,一方面,要推进建党纪念仪式供给规范化。仪式活动的开放性使其随时可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非法征用的对象,个体或集体的建党记忆因之面临时刻被销蚀的风险。因此,应以法治化方式强化对建党纪念仪式的法权安排,以制度化方式稳定共同体成员对建党纪念仪式的心理预期,以重复化方式累积建党记忆的权威叙事厚度,持续增强和确证建党纪念仪式的效用性。另一方面,要科学操演仪式。仪式不是刻板的静态呈现,而是鲜活的实践表达。应合理把握仪式边界,规训身体实践、衣着仪态和利用党旗党徽、标语口号等外显伟大建党精神的象征符号,多维度排列展演建党历史情境,创设“感染域”、生成“在场感”,在积极的形象自塑中驱散虚无情绪和虚无价值,引导个体从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中汲取精神力量,夯实信仰之基。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建党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关于百年大党共有的历史认知、情感体验和精神信仰,是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习近平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16][p.17]}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消解,整合记忆载体,用好记忆机制,以正确党史观、价值观正本清源,守护好红色建党记忆、赓续好伟大建党精神,增进全社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推进强国建设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3][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5]陶俊怡.红色基因传承的文化记忆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21,(5).
- [6][日]石川禎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7]杨悦.中国共产党对建党史事的言说与阐释(1921—1951)[J].苏区研究,2022,(1).
- [8]陶俊怡.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红色记忆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3,(7).
- [9][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M].王菲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0]姜金林.对陈独秀建党实践局限性的历史考量[J].湖北社会科学,2013,(6).
- [11]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12]葛彬超,孟伏琴.技术至上主义对青年红色记忆的消解及其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2022,(3).
- [13]黄煌华.红色记忆的赓续逻辑:唤起、建构与刻写[J].思想理论教育,2022,(4).
- [14]潘丽文.青年政治认同建构的红色记忆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18,(10).
- [1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澄宇

The Essence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oes not simply ref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should becom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f multi-fact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in line with the ti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dapted to modern large-scale production. To underst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o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on all factors in an all-round way;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material culture, but also on cultural-ethical advancem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will create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herently entail a new form of socialist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today include both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They will joi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stead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ao Yong-xin)

Xi Jin-ping’s View of Bolster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ts Rationale and Methodology: The cause of bolster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that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tered a stalemate phase.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composure and have firm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ush the anti-China forces’ attempts to deflect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overall westerniz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rationale for bolster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as follows: firstly, as the rule-of-law model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he unity of diversity, China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its own rule of law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bolster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secondly, the lessons of the failure to copy foreign models of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 suggest China can only choose the rule of law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conditions,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reason for bolster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irdly,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fi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which is the practical reason for bolster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way to bolster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to apply Xi Jin-ping’s policy of “remain calm, stay focused, seek progress in a stable manner, take active actions, unite as one, and dare to fight” to all areas of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Zhang Hao-nan, Hao Tie-chua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Red Classics Adapt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adaptation of red class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 which contains distinctive values such as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revolutionary justice, ethical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adaptation of red classics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y adhering to the seriousness of adaptation principles to emphasize the ideological nature of the content, upholding the innovation of adaptation methods to foreground the diversity of the form, and maintaining the sublimity of adaptation purposes to highlight the epochal nature of educating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daptation of red classics has also encountered multipl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prominence of capital logic, the infiltration of erroneous thinking, the confusion of cultural market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reative subjects. Therefore, the adaptation of red classics in the new era should enhance the persuasive, communicative, infectious and affinity power of red culture with the authenticity of red resources, the epochal nature of central ideas, the vividness of plot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a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Wang Zi-xia)

The Historical Nihilistic Dissolution of the Mem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mem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har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s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and spiritual bond that consolidates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CPC, the mem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ha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refle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PC’s establishment in a coherent manner, analyzing and identifyi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ntegrating and condensing the value consensus. However, through blurring the factual mem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voiding its symbolic memory, and eroding its digital memory,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ruptured individual memories, compelled individuals to reset their memories, and induced bias in individual memories at a deeper level. In response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emory of the CPC’s founding by historical nihilism, we must forge the Party’s memory code with diversified concrete symbols, inscribe the historical light and shadow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with the contextualized “memory field”, and continue the great spirit of founding the CPC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memory. (Wu Bao, Wu Xue-qin)

Lenin’s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ystem in His Late Year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Lenin’s exploring the ro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his later years underwent a fourfold transformation of theoretical logic. He put forward a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constantly deepening his thinking about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ts main contents include: ensuring the alliance between workers and peasants as the logical origin, taking Soviet power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s the dual premise, considering the peasants’ cooperativization as the main task, defin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organs as the focus of the work, and applying the style of “prudence and circumvention” as the strategy of struggl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Lenin’s useful experience in exploring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the cooperative system in his later year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urther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uphold and develop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ai Yuan-yuan, Cheng En-fu)

The Hundred-Year Logic of Objectification Criticism and De-Objectification Deduction: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objectification is the